

碎金

碎金文丛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李长之 著

最好聽的
音樂是鳥
叫
長之
四九年八月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11392

G12-53
17

碎金文丛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北航

C1697560

G12-53
17

010113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09487-0

I. ①迎… II. ①李… III. ①文化事业—建设—
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2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金文丛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李长之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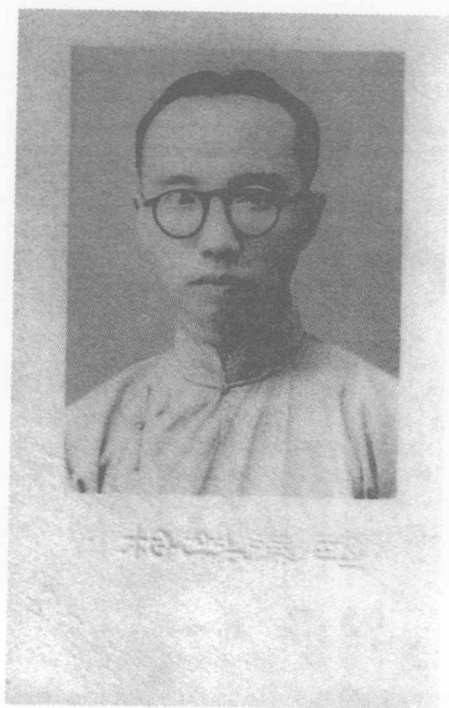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插页 2

定价: 30.00 元



1946 年摄于北平

最好聽的
音樂是鳥
叫
長，
1945年八月

1945 年为梁实秋先生小女儿梁文蔷纪念册题字

陳
全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

——谈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于天池 李 书

(一)

1944年元旦，《时与潮》副刊编辑部组织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柳无忌、潘菽、李长之等24人发表新年随感，文字多寡不同而统以《新年的感想》为大标题。长之先生发表了如下的感言：

我很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两大切实的基础上切实而且发扬起来：一是中国古代神话之科学整理；二是应该有一部好的中国语言史，那语言史最好是特别重在以语言哲学为根据，看几个大段落里与文化形态相当的文法构造。

感言不足百字，与他人迥异，也与新年贺词的吉祥语氛围不合，粗看起来挺突兀，似乎有点没头没脑，当时就有读者对此大惑不解，写信质询。长之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请他们先看一看 194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丛书”中自己所写的《北欧文学》自序。

《北欧文学》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几乎同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自序写于 1943 年的 11 月 24 日，比是年年底写的《新年的感想》早一个月，比《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所收的最晚的一篇文章《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1943.12.5）早 10 天。《北欧文学》“自序”主要讲在编写《北欧文学》过程中的八点体会，其中有几点是这样的：

我深感到在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一八六四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一八〇九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一七七八年之提倡民歌，格利姆兄弟在一八一九

到一八二二年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一八四一到一八五一年之步格利姆的后尘，如挪威阿逊在一八四八年之整理文法及在一八五〇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略恩洛特在一八三五到一八四九年之恢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般生、斯特林堡这些烜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在北欧各国的文学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当初经过一个时候的语言的混乱（那是由于国外战士之归来，异国教士之广布，及以外邦学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没有人对古代民间文艺有着重视，民族史诗也阙如（《厄达》乃挪威民族的产物）。看到这里，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看到这里我们对于像赵元任、黎锦熙诸先生对于语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我深感到各国的文学运动，大学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于一四七九年，是北欧文学的重心所在，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就在这里发出了指导北欧文学的号音，这不必说；就是成立于一四七七年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是磷光派的发祥地，给瑞典的浪漫运动揭了幕，给瑞典的民族文学作了先锋，因而引出高特派之重视民族神话；而挪威奥斯陆大学之成立于十九世纪初，因而有二十五岁的历史派的学者凯塞尔之讲学，促进挪威民族意识的形成，让挪威作家的力量若万马奔腾似的活泼而富有生气，大学的功用有多么大！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善为爱护并运用了！

我深感到外国作家之解放，之方面多，之受政府的援助，之在国内的重要。古代的宫廷诗人不必说，他们时而为座上客，时而为阶下囚；就是后来的瑞典的摆耳曼，在死时召集了朋友，为他们各自歌唱特殊的友情，表现自己最后的并不衰歇的才华；温耶之当水手，经营实业，从政，做律师；斯特林堡之做记者，做演员，做医生，

做电报员，做图书馆员，做舞台监督，他们何等奔放！生活何等丰富！至如斯诺里又是军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学者；阿耳姆吉斯特则广及于哲学、语言、新闻、民间读物、经济、数学。他们方面又如何？但是我们呢？“不离名教可颠狂”，是传统的遗训，现在一有一个人是多面多一点，则所涉及的一行便都群起而忌之，唾之，我们如何能望我们的作家的生活之丰富，对人生了解之深透，并他们那天才之发扬呢？社会上应该宽一点！外国政府，特别如挪威，对于作家的资助，也大可为法。许多作家都是由政府资助，才可以出外旅行，收集材料，获得灵感；易卜生、般生，固然天赋高，这种培养也是要的。说到作家在国内的地位，如般生之代表国民而拍着国王的肩膀，欢迎他就位，这也令人感喟无穷，不重视作家的国家和国民，不唯难以有好作家出现，就是出现了，也难以得他们的泽惠的！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引了部分感想。在这些感想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第一条中最重要的是“在

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般生、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这些感想，不仅是解读长之先生《新年的感想》密钥，对于理解《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是指引。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长之先生探讨中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文化走向的文集。他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自序”中追溯了此书的创作过程，“那思索的开始，方是大战的开始，现在书将完成，也是胜利将要完成的时候了”，从1937年算起，“超过了五年了”。但是，他具体而微地论述抗战后的文艺复兴问题，却主要集中在1942、1943两年中，集中在其编写《北欧文学》的前后。比如本书《“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1942.4.28）及其附录《评〈新理学〉》（1942.9.5）、《评〈新事论〉和〈新世训〉》（1942.9.27）、《评〈新人生观〉》（1942.3.16），《文化

上的吸收》附录《论翻译工作》(1942.10.2),《战争与文化动态》(1942.7.6)及附录《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1943.12.5),《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1942.4.25),《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1943.5),《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1942.11.26)。正是对于北欧诸国文化的探讨,进一步激发了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战后文化重建的思索,勾起了他对于中国如何在经过“战争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基础上,复兴中国文化,乃至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怀想和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欧文学》自序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自序可以看作是姊妹篇,可以対读,对于阅读《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很有裨益。

当然,不能说《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北欧文学》简单的后续或催生的结果,它是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长期观察、思索、研究的产物。

长之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小学时期,他已经通读了中国的文化典籍。在清华大学期间,在杨丙辰先生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德国古典时期康德、歌德、温克尔曼等学者的德文典籍。在中央大学教学期间,他借助英文版阅读了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等人的全集，出版了《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北欧文学》、《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等。他在《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虽然文化问题，人人都可以有意见发表，但是负责的意见却必须在态度、技术、知识三个方面有所要求，他说：“从前人讲治史学，须有才、学、识。后来章学诚又加上还须有史德。德是属于我所谓态度，才和识是我所谓技术所自出，学就是我所谓知识了。不谈中国文化则已，谈也便需要这才、学、识、德四者！”具体说到知识上的条件，长之先生认为：“第一，谈中国文化，必须先懂得西洋文化”；“第二，谈文化，便不能忽略民族性”；“第三，谈文化应先把握文化世界中特殊的法则”。因为“糊涂和奥妙，晦涩与含蓄，耳食与独得，迂腐与正大，都往往相去一间”。长之先生列举的这些条件虽然比较苛刻，但确实是心得之言、有识之论。他是具备这些条件的，这也是他在谈中国文化问题时颇为自负之处。

“抗战以来，谈中国文化的特别多”，不少人都在议论中国将来的文化走向，渴望中华民族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再现往日的辉煌。这些议论，确如长之先

生所说：“精彩的固有，‘鱼目混珠’的也确实不少。”在精彩的议论中，《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同于政治家的富于煽动性的豪言空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空泛的热情之议，而是以一个饱学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文化。他以此期盼并策划中国的文化复兴，献计于国家和民族。这是大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依然感到《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沉重的价值，也是重读其书后敬佩、感慨和叹息之处。

(二)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共收录了长之先生从1937到1943年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15篇文章，如果加上附录是18篇。这18篇论文虽然分别写在抗战的8年时间里，却有一以贯之的思绪，就是以“文化国防”为“基本间架”，围绕着期待中国文艺复兴这个主题而编纂排比。同为抗战时期长之先生的作品集，较之《苦雾集》和《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不再是一个时间段落的论文杂俎，书名也不再带有浪漫色彩和诗意，而是有系统、有组织、

有明确主题的文章集。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大致分为五部分。第一篇《论如何谈中国文化》和第二篇《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带有前言和大纲性质。前一篇是体系的，开宗明义谈论中国文化所需要的立场、态度和相关知识。后一篇是历史的，站在“抗战中建国”的立场上，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文化方面的进展，认为中国文化上的建设“必须是衔接（不是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后可”。——从而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根基。《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写作时间最早，却包含了全书的种子。

第三篇《“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和第四篇《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是继续深化对辛亥革命以来文化发展的趋向进行评述的论文。《“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是长之先生一生最满意的作品之一。在文中，长之先生说：“‘五四’所象征的时代精神是甚么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我看并不是。”“假若要用一个名称确切以说明‘五四’精神的话，我觉得应该用启蒙运动。”“‘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